

中国知识分子使命与社会关怀的转化

范丽珠

进入 21 世纪的中国,与人们时刻感到全球化的脚步声同样令人不能不刮目相看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变化,也许有人讲在十几年前改革开放的初期,不少知识精英已经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一改宁守清贫的君子形象,“下海”经商;而当今一群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关心与关怀依旧,他们的最大变化是他们不再清高地守着学问的象牙塔,真正地与社会痛与哀结成生命的同体。这是我参加“跨文化对话的回顾与前瞻”国际研讨会的最深感受。

当今的知识分子不再是愤世嫉俗的激进者,也不是老百姓揶揄的那些书呆子,他们正在从小事情做起,其目标是“建立一个协力、尽责多元的世界”。他们用理性在思索,思索国家事、天下事,思考环保、教育、贫困、发展等等;他们寻求合作,与社会上的各种力量携手,希望把人文的关怀与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中国知识分子在新的时代,没有失去自我,他们首先捧出自己的社会良心与其社会团体一道建构一个伦理基座,形成符合世界新状况的生产和生活模式以及社会与政治规则。

建设市民社会文化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得以发挥其能力的最好的用武之地,当中国人越来越多地受到由现代物质生活带来的实惠之后,物质至上的逻辑却不断地受到质疑。我们知道,社会中最有权力的政府与经济部门都追求利益的最大化,那么怎样才能够在一个功利主义盛行的时代寻找到一种东西来平衡功利为人们带来的种种问题,虽然功利的获得和价值理性具有普遍价值,但是人

们同样也发现忽略了那些不能被计算、量度的存在,例如生命、痛苦、欢乐和爱情;忽视不可计算、不可变卖的人类精神财富,诸如奉献、高尚、信誉和良心的社会是不健康的。于是,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家在寻求政府与企业之外的社会力量,因为人们在社会资源的配置中既看到了市场的失败,又看到了国家的失败。于是人们不断地去发现社会生活中的“第三领域”之意义,特别是个人作为社会公民对于社会所应该承担的责任。日益凸显出来的渗透在“第三领域”的中心理念是人类无私地帮助他人的愿望,故而在现代化以所向无敌的工具理性征服全球的时候,一场“全球性的社团革命”却以非营利为最明显的特征。

可是人们还是难免有疑惑,疑惑的是中国人能否在不断高唱自我价值实现中养成对公共事业的关心。事实是在经历了若干年的所谓无私奉献的革命主义教育后,人类的共善之心与“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的雷锋精神一同受到广泛质疑,甚至出现了群体逆反的现象。利己主义、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在举国上下经济发展至上口号下,大行其道,获得了绝对的正当性,“自我”这样的字眼被写得越来越大,这使得人们在推动第三领域发展时不能不有各种忧虑。因为一个非常矛盾的问题是,如何在个人利益至上,功利主义盛行的时代找到人们热心于非营利事业的内在文化支援力?

首先,我们发现现代人实际上并没有忽视道德与意义。虽然现代化的巨轮驶来时,碾过了无数传统的大厦,任何人也无法在瓦砾中捧出一个曾经完好的“道德”,同样不能期待以往支援人们“对他人之爱”的道德情感依然故我。但是在人们凭吊旧时德行时,其实也无庸气馁。因为现代社会有其自己的逻辑让人们去思考与公共生活之关系和人生意义的同时,又重新唤起人们心中的“善心”。即使是被公认为崇尚个人主义的美国人也始终关注这样的问题:“公共生活对个人生活来说能够具有什么积极意义呢?个人对他的工作的长期社会效应负有什么责任呢?个人对环绕他自己的家庭和朋友们做成的圈子周围的芸芸众生,又负有

什么样的义务？这种缺少人情味的大都市能否成为一个忆旧共同体呢？”（《心灵的习性》267页）聪明的现代人不断地发现，工具理性可以改变人的物质生活，却无法为人的生活提供意义；法律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社会控制，维持正义，但是社会的善归根到底取决于个人的善，而不是机构的健全和法律公正。

不管怎样，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多元化的模式和选择，于是道德原则不再由官方或贵族掌握，而是一个越来越平民化的公共物。事实上，无论是传统的基督教“对他人之爱”还是中国的“君子之至善”，在托克维尔看来都是当时官方的道德原则的一种反映，“当社会由少数几个有钱有势的人统治时，他们喜欢培养人们对义务的崇高思想，乐于主张忘我是光荣的，认为人应当像上帝本身那样为善而不图报”。尽管在欧洲，人们仍然每天装出一副非常具有献身精神的样子，其实他们心中早已没有这种念头。这样的道德原则很难真正为一般平民百姓实践，这样的“道德”是被有钱有权的人为了永恒存在而用于驱使他人的手段。人们没有理由为“人心不古”而忧虑，尽管传统时代道德是被不断讨论的问题，事实上其道德水准未必比其他时代更高尚或者说比其他时代更讲德行。

现代社会德行之美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要求别人自我牺牲的道德宣教变成被人们嘲笑的物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们的字典里没有了道德，失去了公益心，丢掉了公共利益。正如托克维尔发现的那样，“尽管在人的大部分行动受私人利益的支配这一点上，美国并不亚于其他国家，但在美国，私人利益不能支配人的全部行动”。（《美国的民主》）因为他不断地看到美国人为公共事业做出巨大的和真诚的牺牲，并且多次发现他们在必要的时候几乎都能忠实地互助。

我们看到在中国文化中，劝善与行善，是中国社会最基本的道德律，福善祸淫之说见于先秦儒家思想之中，这种为善的思想后来在后世善书中则被视为发挥积善余庆及作善降祥的道理。宋代《太上感应篇》问世之后，宋理宗为刊本亲题“诸恶莫作，诸善奉

行”；明世宗为《感应篇》作序；清世宗令人刊刻该篇，颁赐群臣，有撰《劝善要言序》以示提倡，并译为满文流传。清代善人的活跃、善会善堂兴起与善书在民间流行，是相互关连的社会现象。士庶在家修持，以善书为经典，在日常生活中作道德实践，所谓与人同善；善书有劝行社仓文、育婴文等劝办善举的文字；明末以来有同善会，借助每次聚会，进行劝善演讲，以便在乡里形成一种人人向善即“同善”的良好风习。同时中国人普遍有崇德报功的信念，故比较能够接受慈悲的教化以及布施于是积累公德最佳的方式。我们上面曾提到的善人、善书与善堂实际上也是传统宗教信仰世俗化的真实表现。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是《了凡四训》的作者袁黄本人的经历所验证的个人努力做善事，通过神的帮助就能实现人生的理想。《了凡四训》的作者袁了凡（袁黄）是明朝人，他幼年时，有一位孔先生为他算命，判定他“县府考学院考名次，并某年补廪，某年出贡，某年当卒，寿五十三岁，无子”。（见《有福读书堂丛刻续编》第17册，页1。）袁黄前几次考试和名次、年份，完全符合当初的预言。他就因此而相信命运的安排是不可改变的，心情也因此而沮丧。后来他在棲霞山遇到云谷禅师，云谷禅师告诉他天下只有庸庸碌碌的人才被运数所限定，最好和最坏的人都不受这个定数所限制。“一切福田，不离心造，皆可以人力挽回”。他将一本功过格交给袁黄，“照此奉行，不特富贵功名可得，即希贤希圣，尽在是矣”。袁黄拿到这本书后，就在神前发心许愿。行三千功之后，就通过举人考试。又许立三千功，得到了儿子。袁黄有了这两次经验后，相信只要努力行善，就可以将原来命中的事，改变过来。他原来命中无子，因为行善，就有了儿子。于是再立愿行一万善，以求得进士。

袁黄的经历和他的《功过格》包含着信命运、改命，然后在现实人生的积极努力中获得人生突破，从而圆满人生。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的神秘信仰中，所包含的并不全是消极的成分，更有透过神秘的精神和自己的努力向善而挑战命运的因素，得到积极的人生精神，这正是袁黄和他的故事在今天仍然有启发意义

的关键。我在深圳的调查中发现,有些信徒出于种种不同的理解但是对于袁黄通过做善事来立命处世非常景仰,愿意效法其以诚的精神去面对命运,心中真诚能与天地鬼神打交道。所谓“上思报国之恩,下思造家之福”,没有任何遁然于世间之外的提示,反而充满了行善去恶的济世理念。袁黄的故事和《功过格》在民间一直很流行,至今在中国它仍然有其追随者,因为人们相信,只要自己发心,照着袁黄的办法去做善事,终有一天是可以成功的。我在深圳作研究的时候,发现不少非常有成就的现代人感兴趣《功过格》和《了凡四训》等善书中所反映出的善观念,并在日常生活中努力地身体力行。

正是人类这种共善之心,可以使知识分子关心的“协力、尽责和多元的世界”有了实现的可能,而不少有识之士也因此开始了用新的方式来展示其对社会的关怀。因为深藏于人类内心的对善的追求与对他人关怀的慈悲心是现代社会中非营利事业存在与发展的可能。在这方面由美国五位著名社会学家贝拉(Robert Bellah)、马德森(Richard Madsen)等所著的《心灵的习性》有较清楚的描述,该书就是以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之间的联系为中心,了解人们参与公共事物的理由和日常生活中公民意识的志愿精神如何成为重要的部分。发现人们至少在理论上相信,一个自私自利、纯粹追求个人成功的人,是不可能生活得美好、幸福、快乐的。然而,他们思想上认可可以弥补个人追求经济成功不足的慷慨之情,就是自愿参与一些地方性的、小范围的社会活动,诸如家庭、俱乐部或理想化了的社会群体,在这种群体中个人积极性与改善全体利益的相互关系相得益彰。因为现实告诉人们:个人的自我,是在通过公共对话组织起来的社会生活中,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实现的。这种必要的对话,只有通过忆旧共同体——无论是宗教的还是公民的——才能得到维持。因为人们大多认为,只有当他们自愿承担义务而不是被迫承担义务的时候,才能感受到真正的快乐。

中国知识分子恰好在透过新的社会各方面合作重新定位自己,在引领社会寻找道德与意义方面展现出前所未有的价值。因

为现代社会有其自己的逻辑让人们去思考与公共生活之关系和人生意义的同时,又重新唤起人们心中的“善心”。在努力脱掉了传统伦理贵族外衣后,使道德与生命意义的实现成为普通人可以关心的问题,并轻易地表现为其对社会或巨或微之关怀。人们不再期待成为不朽的圣人或神明,而是在日常生活中透过一些小事、组织同契的团体、参与社会公共事务,逐渐养成大批公民循规蹈矩、自我克制、温和稳健、深谋远虑和严于律己,这样我们就能够对—一个多方面健康的社会有期待。

如孟子所云,挟泰山以超北海,如果说不能,是真的不能;而为长者折枝,如果说不能,则不是不能,是不为也。21世纪初年中国知识群中开始有一些人远离沉重,为我们的民族新的健康的发展寻找易行之道,实在是可喜之事。虽然我们面对了那么多前所未有的社会问题,环境恶化、新的贫困人群、少年失学问题等等,但是我们在做,这些问题已经不再是“肉食者谋之”了,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知识分子放下了架子将自己对社会关怀的使命融入整个社会人群之中,并发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的资源。

“跨文化对话的回顾与前瞻”

国际研讨会主题之三:

经济一体化与文化多元化的互动与冲突

跨文化交流是一种本质性的交流,不仅是为了丰富自己,更是为我们要共同管理我们的地球。一方面我们要避免文明的冲突,另一方面,要避免文化霸权主义的一统天下,这意味着文化间的接近。一方面取决于寻找共同价值的愿望,另一方面也建立在迎接共同挑战的对话能力。

关键词:跨文化,交流,冲突,接近,建立对话的能力。